

福州人在美國：我的辛酸你不懂

Sherry 和老公 Nick 打算在幾個月之內買下一家中餐館。他們選擇了東百老匯 1 號的一處店面，那里位于唐人街的中心位置，將來的生意應該很好做。現在，最令 Sherry 放心不下的就是 3 歲多的兒子阿布。

在美國，法律規定幼兒不能獨自留在家中，而一直在中餐館打工的 Sherry 夫婦根本無暇照顧孩子。如果將孩子放在保姆家寄養，每個月需要增加近 2000 美元的開支，這讓原本就不寬裕的家庭負擔更重。2011 年底，阿布出生剛滿 4 個月時，Sherry 做出決定，將兒子送回國內，交給遠在中國長樂老家的父母照顧。

3 年過去了，Sherry 和老公一直沒有時間回到中國，每天只能在下班之後通過視頻跟兒子“交流”。今年年初，難以忍受思念之苦的 Sherry 和丈夫下定決心，一定要開一家自己的中餐館，儘快賺錢把兒子接到身邊。

Sherry 夫婦的生活只是衆多福州人偷渡到美國後的一個縮影。紐約是美國最繁華的城市，市區人口多達 2800 餘萬，其中華人 40 餘萬，而福州人佔絕對數量。紐約市皇后區公共圖書館所公佈的《紐約移民人口報告》稱，在紐約的華人移民者中，僅福州長樂人就有 20 餘萬。

“世界人民怕美國，美國人民怕長樂”

“男人就要有勇氣出國，只有沒本事的人才在家里吃苦受窮。”美國福建商會會長林慈飛說，在長樂，這樣的觀念已經深深地烙在當地人的思想之中，幾乎所有的鄉村都是以是否有家人出國海外來衡量一戶家庭的身份和地位。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曾經做過調查，大批福州人奔赴美國主要集中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其中超過半數是經由非正式渠道出國，也就是所謂的“偷渡客”。他們在“蛇頭”的帶領下，一般都是以旅遊的方式“合法出境，非法拐道”，通過一些中轉國最終抵達美國。

Nick 清楚地記得，15 歲初中剛畢業那天，自己便有了去美國的想法。兩個月後，父母四處籌借到 40 萬元人民幣，作為 Nick 的偷渡費用。從踏上偷渡之路的那天算起，Nick 與同行的老鄉整整花了 7 個月零 9 天才進入美國境內。

“我們中間走了十幾個國家，有莫桑比克、安哥拉、瑞士、西班牙、英國等等，可以說是繞了大半個地球才到達美國。”Nick 說，“像我們這樣子的，直接通過簽證去美國基本不可能，必須要以第三方國家作為中轉站，以旅遊的名義在不同的國家飛來飛去，而且很多地方都是獸了一晚上就走，並沒有別人想象的那么美好。”

“這種偷渡方式在長樂本地被稱為“換人頭”。比如他從中國飛到泰國時，用的是本人護照，到了泰國之後，他會換一本假護照飛到另一個國家，如此下去，直到最後飛到美國或美國的邊境國家。”Nick 說。

在這大半年的路途中，Nick 不僅與家人完全失去聯繫，也曾經因此被關進監獄。“到了法國時，海關人員發現我的護照是假的，就把我扣留下來，然後一直盤問我有關假護照的問題。為了不被遣送回國，我只能閉口不言，拒絕回答，後來就被他們關進了監獄。”Nick 說，十幾天之後，“蛇頭”找到律師，才把他從監獄保釋出來。

在福建的偷渡史上，相比另外一些偷渡者來說，Nick 是幸運的。1993 年 5 月，一艘名為“金色冒險號”的貨輪，搭載著 200 多名福建籍偷渡客穿越太平洋。在原定計劃里，美國方面的接頭人將在公海上接載這些偷渡客上岸，不料，那個接頭人在華人黑社會“福青幫”的仇殺中死亡。在公海上無助地等待了兩周之後，“蛇頭”料到接載無望，在一個清晨將船擱淺，讓偷渡客自己游泳上岸。由於長時間的海上航行，一些偷渡客身體虛弱，再加上有人不會游泳、水溫寒冷等原因，最終 10 人溺水身亡。

“金色冒險號”的悲劇並沒有結束。2000 年 6 月 18 日，英國的多佛港口駛入一輛來自荷蘭的運載西紅柿的冷藏貨櫃車。在例行檢查中，海關警察在打開該車的後箱時，發現了一幕慘不忍睹的景象。車箱內部疊放著幾十個人，惡臭令人作嘔。看到很多人已經不省人事，警察立即採取搶救措施，可最後只有 2 人幸存下來，其餘 58 人全部死亡。他們全都是福建籍的偷渡客，其中 23 人來自長樂，28 人來自福清。這就是當年震驚中外的“多佛慘案”。

後來，幸存者向外界透露，他們從福建出發，經俄羅斯、捷克等國進入歐洲，歷經幾個月的長途路程，吃盡了苦頭，不幸最後大多數人還是在抵達英國的途中，被密閉的空間活活悶死。

2001 年 1 月 19 日凌晨，時隔半年，運載著 58 名偷渡者遺體的專機在福州緩緩降落。濃濃夜色中，一具具棺木被抬上卡車，送往長樂、福清等鄉鎮。

自古以來，福建沿海居民就有出海謀生的傳統。有關資料顯示，大批福建人移民美國始於 1992 年，僅第二年便有 2 萬多人通過各種方式偷渡至美國，一直屢禁不止。在長樂地區，村民經歷重重磨難到達美國之後，會馬上開始帶下一批老鄉偷渡，他們就以這樣的方式，一代代相互引領，在美國形成了聞名海外的“長樂幫”。

“在美國的長樂人不僅相互扶持，他們也會向遠在國內的親友拋出橄欖枝，吸引他們趕赴美國。”林慈飛說，“現在，長樂人在美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移民幫，他們不斷以集體遷徙的方式移民到美國，難免令美國政府有些無奈，於是便有了“世界人民怕美國，美國人民怕長樂”的說法。”

在美國的華裔群體中，有這樣一個說法：如果你會說福州話，就不可能餓死在紐約唐人街的街頭。通過偷渡或美國的親戚的引領到達美國之後，大批長樂人便開始陸續進入紐約唐人街。現在，長樂人已經成為紐約華裔群體中最大的族群，不僅如此，紐約唐人街的東百老匯街已經被稱為“福州街”。

還不完的債務

在 Nick 的老家，沿途可以看到一棟棟嶄新、豪華的洋房，據說，這些都是當地人偷渡異國之後寄錢回來蓋的。Nick 說，長樂人很愛面子，周邊的幾個華僑村也都在互相攀比，村里的文化中心、公共設施很多都是由遠在海外的華人捐建。“很多人都只看到出國的人表面上風光無比，卻不知道他們在國外打工的血淚心酸。”

Nick 剛到美國的時候，幾乎是兩手空空，身無分文。他寄宿在紐約唐人街的一個老鄉那里，第二天一大早便被領進一家中餐館打工。從上午 10 點到晚上 11 點，Nick 幾乎每天都處在“戰鬥模式”，對於他來說，在餐館打雜工就像在戰場上打仗一樣，不能有絲毫懈怠。

“剛到美國就被送到中餐館打雜，一做就是兩個月，中間沒有休息一天。工作一整天下來，有時候累得腿都腫了，晚上回到住處幾乎連洗澡的力氣都不想動。”Nick 笑着說，自己當時也有累到不想幹的時候，但是一想到自己身上還欠着 40 萬元人民幣的債務，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做下去。

“很多人看到別人偷渡，也想辦法過去。結果發現遠不是那么回事，後悔也沒有用了，只能混一天算一天。”曾在美國《僑報》做過 3 年記者的張凱說，“這些年偷渡者越來越少了。”

在閩江口地區，偷渡客又被稱為“萬八客”，因為早期偷渡到美國的費用是 1 萬 8 千美元。後來，隨著偷渡人數的增加，偷渡費也趁勢不斷漲高，到了 2000 年前後，已經漲至五六萬美元。

“這種偷渡移民，用这么多的錢去美國，那他在中國不是能夠享受到很好的生活嗎？其實並不是這樣，這筆錢並不是他們原本就有的，而是通過偷渡移民去獲得融資，獲得外部對他的人力資本的投資。”清華大學華裔研究中心主任龍登高說。

“一般來說，10 年以後，他就可以到紐約之外開一個餐館，買房買車，這個時候他就成為老闆、成為企業家了。他們十年磨一劍，幾乎算是翻身了，而且他們的下一代也跟着翻身了。”龍登高說，“這對於中國的農民來說，不具備普遍性，只有極個別的人才能夠這樣。你想啊，我們的農民到深圳、北京去打工，他要獲得北京戶口、深圳戶口，幾乎不可能，但是他偷渡到美國去，他就有可能獲得綠卡，甚至可以獲得美國國籍。”

也可以說，偷渡費就相當于一張入場門票，偷渡者們之所以不惜花費巨款買票，目的就是能讓自己有一個更好的將來。

現在，Nick 和 Sherry 即將要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家中餐館。從打工仔上界到老闆，這意味著夫妻兩人將要進入更加繁忙的工作狀態，沒有個人空間、沒有朋友圈，全身心投入餐館的經營中。就像另一位偷渡者安琪所說的那樣，“我們一輩子都在還債：先還偷渡的債、律師費的債，再還買餐館的債，最後還買房子的債、子女的債。太累了。”

安琪今年 27 歲，是 2 個孩子的母親，也是

經歷家庭悲劇依然樂觀 18 歲華裔女生獲寫作大獎

4 月 11 日電 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寫作是我最親密、也是最喜愛的傾訴方式，它承載著我所有的喜怒哀愁，永遠陪伴著我，不會離我而去。”當 2014 年紐約時報獎學金十名得主日前揭曉的那刻，亞洲研究雙文高中 12 年級學生李思佳，為躋身得主之列感到既驚喜，又以為他們把名字弄錯了。

這個福建移民家庭之女雖然才 18 歲，但她親身的經歷和承擔的責任，遠遠超過這個年紀。而這一切，都已成為她的個人資產，讓她一路走來感受、沉澱、勇敢、堅強，並對未來充滿希望。

雖然是在紐約出生，但李思佳從小就被送回中國生活，六歲左右才又回美。因為全家都做餐館，她和弟弟不得不跟家人輾轉各州。幾進幾出紐約的經歷，讓她對這個如今終能稱之為“家”的地方，既有依戀，但又不敢過於依戀。“我當時讀的是雙文學校，就在櫻桃街。熊周玲校長對我很好，至今我都對她予以我的關心感激不盡。可惜沒多久，爸媽在威斯康星州開了餐館，我和弟弟就離開了紐約，到那里生活。”

鮮少團聚，卻也終於團聚了的一家四口，本想在他鄉迎接新的生活，但這種“新”的生活，未免來得太悲情、太殘酷。

“媽媽去世的那年我剛九歲。回來美國的時候我已經六歲了，真正和媽媽朝夕相處還是到了威斯康辛之後，想想也就半年的時間。我對她，沒有太多記憶。”李思佳用儘量平靜的語氣，勇敢地推開慘劇發生那天的門。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是一個周五的下

一家名叫“長城”的餐館的老闆娘。在紐約待了 10 年，安琪幾乎每天都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她沒有去看過自由女神像，也從沒有出州遊玩過。自從 17 歲離開福州至今，她從沒有回過一次老家，一天工作超過 12 小時，日日如此。

安琪說，2011 年懷上二女兒樂樂時，很多人勸她不要再工作了，“我知道油煙對胎兒不好，但也沒辦法。”直到樂樂出生前的 1 個小時，她還在店里忙著炸雞塊。現在，樂樂也被送回福建老家撫養。她說，現在的目標是多賺點錢，把中餐館轉手賣掉，做一種既能儘快還掉債務又能照顧女兒的工作，比如美容店。

槍口下謀生

在紐約，比起在家做飯來說，人們似乎更喜歡用電話叫外賣。從寫字樓到公寓，經常能看到一些華人外賣郎送餐的身影，尤其是遇到周末或是颶風下雨的壞天氣，有時候一部電梯里甚至能同時遇到四五個送外賣的華人。曾經在紐約做過外賣郎的林慈飛說，目前紐約的中餐館 90% 以上是由福州人經營，這些外賣郎也多來自福州。

然而，近些年來，隨著中餐館走俏，紐約地區經常發生中餐館外賣人員被搶、被搶甚至被殺害的惡性案件，過去幾年里被害的外賣郎多是福州人。今年 43 歲的老王來自福州連江，他的工作就是在唐人街一家中餐館送外賣。老王說，由於自己沒有一技之長，到美國八九年來一直都在送外賣。“剛開始送外賣時，由於不懂英文，想找個人問路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把餐送到之後，顧客又說等得太久，不要了。有時候，我甚至不敢走進僻靜的地方，就怕遇到搶劫的。”

2014 年 2 月 25 日，中新網發出一則報道：在美國馬里蘭州一家中餐館工作的陳先生，在送餐途中遭到一男一女持槍搶劫。子彈從他的後臉頰射入，最後醫生從他的耳後脖子部位取出彈頭。事情發生在 2013 年 10 月。當天晚上 11 點左右，陳先生接到一位顧客的訂餐電話後，便根據對方提供的地址送餐過去。到了送餐地點，他的送餐車還沒有停好，一個女人敲開右邊的車窗，問他送餐費多少，就在這時，另一名男子從左邊車窗朝陳先生開了槍。

後來，陳先生聽說，這對搶劫犯提供的送餐地址根本沒有人居住，警察告訴他，這兩個人已經不是第一次搶劫中餐館送餐人員。

中餐外賣店在紐約迅速增多，一些業主為了增強競爭力只好延長營業時間，無形中為搶劫犯提供了便利。他們無奈地說：“誰願意拿生命開玩笑？還不是為了多賺些錢。”

在紐約，這些通過各種渠道來到美國的福州人，由於語言不通、債務繁重或是還沒取得合法身份，掙的錢一般都放在身上，而且大多數人即便被搶了也不敢聲張，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機。近些年，福州人因送餐而遇害致死的案件不下于 10 起，這些受害人中，年齡最大的 60 多歲，最小的只有 18 歲。

2004 年 2 月，年僅 18 歲的福州長樂籍外賣郎陳煌在皇后區的一棟公寓里慘遭殺害。當天晚上 10 點半左右，4 名少年因無錢購買一雙價值 100 多美元的運動鞋，便興起了打劫中餐外賣郎的念頭。他們先用棒球將陳煌打暈，再用刀子將他捅死，隨後將屍體棄在幾公里外的一個小池塘里。負責驗屍的法醫在出庭作證時，做了 2 個小時左右的報告。報告中指出，陳煌全身共有 25 處傷口，4 顆牙齒掉落、6 顆碎裂或受損，

這些都是由重物擊打所致；他面部的顴骨、額頭都遭到外力重擊，很多傷口都是致命傷。媒體評論其為紐約近年來最殘忍的一起華人被害案。

農村“洋娃娃”

晚上 11 點下班之後，Sherry 洗完澡就迫不及待地地和老公打開電腦，與遠在福州長樂的父母和兒子進行視頻通話。大洋兩岸的相隔，讓這些遠在異國打拼的父母嚐盡了思念之苦，只能通過每天晚上的視頻聊天來緩解。

“我很想念在老家的兒子，說實話，天下沒有一位母親願意將自己剛出生的孩子送到其他地方，但是我沒有辦法，這都是生活所迫。”提到兒子阿布，Sherry 的眼淚不停地眼中打轉。

在美國，不論父母是哪國國籍，只要孩子出生在美國境內，就可以自動獲得美國公民身份。而在這些美籍嬰兒中，有一部分從出生起就意味着要開始一段長達四五年的“獨立生活”，他們就是被送回福建老家的美籍“洋娃娃”。

由於沒有時間照顧年幼的孩子，一般來說，在紐約唐人街打拼的福州父母，都會在孩子出生 3-5 個月後，委託回老家的親戚或是通過專門的渠道，將孩子送回老家。當然，在這之前得先拿到孩子的出生證明，並為他辦好美國護照和中國旅行證。這些幾個月大的嬰兒被寄養在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親戚家里，待 5 歲左右再回到遠在美國的父母身邊。

父母們選擇這兩個往返的時間點是有一定根據的。

嬰兒出生 3 個月後，耳膜的生長已經基本健全，不會因為越洋航班的氣壓對他們造成身體傷害，而從心理上來說，嬰兒待在母親的身邊越久，對母親的依賴也會越嚴重。

選擇讓孩子在 5 歲左右回到美國，首先是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剛開始學著與外界接觸，這個時候學習英語很容易，而且美國公立學校不收費，還有專門的校車接送，相比于孩子在國內接受教育，父母能省下很大的一筆費用。另外，幼兒的美國護照只有 5 年有效期，這時候也正是他們更換護照的時間。

據福州市僑聯統計，目前寄養在福州的美國“洋娃娃”大約有 1 萬多人，其中長樂市 5000 多人，連江縣瑯頭鎮 2500 多人，馬尾區亭江鎮 2000 人左右。長樂市潭頭鎮幼兒園老師羅善峰說，園內的孩子一共 300 多個，外籍的 60 多人，大概佔了五分之一。“因為自己父母沒有在身邊，這些孩子一般會跟老師比較親近一點。”羅善峰說，“肯定也都想父母的。”

這些“洋娃娃”吃著從美國郵寄回來的奶粉和零食，卻十分缺少與父母的親密接觸與交流，所以常常對幼兒園的老師極為依戀，有些孩子甚至拉著老師的衣服，叫她們“媽媽”。

瑯頭鎮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倪法林說，“洋娃娃”的父母遠在海外，為了彌補感情上對孩子的虧欠，只能在物質上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條件。比如連江當地有種黃梅魚，一斤幾十塊錢，但是無論價格多貴，老人們都會買給他們吃。由於老人對孩子過於溺愛，而孩子們回到美國後與父母之間又存在着隔閡，很容易導致各種教育問題和家庭問題的出現。美國華文報紙經常出現因華人子女不服管教，父母對其進行體罰，最終導致監護權被剝奪的報道。

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渠道從福州進入美國的“洋娃娃”，不惜欠下巨債，冒著生命危險來到美國，為的只是將來能夠光宗耀祖、澤被後代，然而這樣的結果不禁讓人感到心酸與無奈。

午。媽媽往常總會來接我們放學回家，可那一天等了好久她都沒有出現，老師打電話給爸媽也一直打不通。晚上我和弟弟終於回到了家，開門就看到了那樣的一幕……”李思佳沒有繼續下去，短暫的沉默，遮蓋起多少永久的觸目驚心。“爸媽當時雇了一個廚師，那個廚師自從來工作

由她去參加。隨時準備處理弟弟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肩膀仍然稚嫩的她從沒叫過苦，“我理解弟弟，我要讓他知道我是可以聽他傾訴的人。”也正是因為家庭的突變，紙和筆成了她的傾訴對象，在日記里她可以讓所有的喜怒哀樂傾瀉而出，盡情釋放，緩解壓力。短則五分鐘的寥寥數句，長則一個多小時的洋洋灑灑，她記錄、思考、感悟。

2013 年夏天，李思佳從全國數百名申請人中脫穎而出，成為普林斯頓大學暑期新聞研習班 (Princeton University Summer Journalism Program) 的一員。該項目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十天免費的新聞從業訓練，這讓她第一次有了接受專業新聞訓練的機會。後來她在老師的鼓勵下又申請了紐約時報獎學金，憑藉杰出的文筆引得評審在她的材料旁備註“很吃驚寫得这么好”。

榮獲獎學金得主頭銜後，她不僅可以在今年夏天到紐約時報帶薪實習六周，還能在整個大學期間享受紐約時報提供的輔導。至於以後是否能到紐約時報正式工作，她臉上的笑意代表了一切，“他們告訴我們，任何時候想來紐約時報，說一聲就好。”

懷揣新聞理想的李思佳說，新聞自由是把美國和其它任何國家區別開來的關鍵。“為什麼大家都想來美國，而不是去別的國家，這都是因為媒體的力量，我願意為此盡己之力。”身在美國、根在中國，她尤其喜歡跨文化的新聞報導，希望通過自己中美背景的結合，向更多人講述他們可能看不到的故事。



後就常和媽媽有爭吵。後來爸媽炒了他的魷魚，他那天回來，是報仇。”

沒了媽媽的李思佳和弟弟又回到了紐約，由伯父伯母代為照顧至今。雖然是親戚，但这么多年過去，“我依然覺得我們是他們的負擔，是局外人”。寄人籬下的生活本就委屈，偏逢弟弟因受到媽媽去世等事情的刺激一直麻煩不斷，聽不進去別人的話，也不愛和別人交流。她不得不扛起弟弟監護人的重任，弟弟學校開家長會，